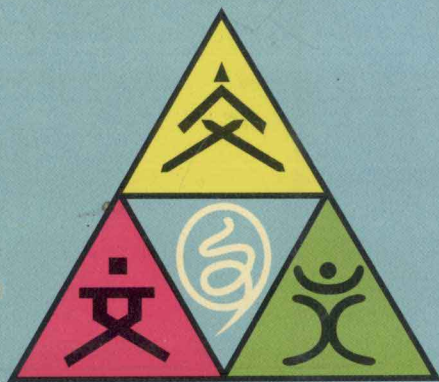


江夏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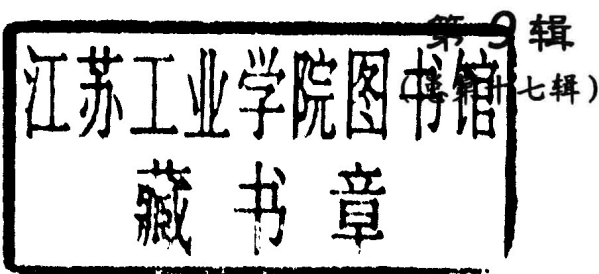
第九辑
(文化史料选编)



江夏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江夏文史

(文化史料选编)



江夏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序

涂才凤

《江夏文史》第九辑（文化史料选编）是一本记载江夏区文化领域史料的书。内容涉及本地区不同时期的民间文化、艺术文化、书画文化以及人文文化、群众文化等，可谓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图、文、诗并茂，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江夏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相当丰富。这辑选编只是在众多的文化史料宝库中的一小部分。以弘扬地方文化，繁荣文化生活，激起人们热爱江夏、建设江夏、振兴江夏的热情为目的，积极为江夏区三个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这辑选编共分七个栏目，从不同角度折射半个世纪以来江夏文化人的真纯、善良、吃苦耐劳和执着追求。在“往事回眸”栏目中，能回想起那热火朝天的集体大协作年代艰苦奋斗的场面。在“人物春秋”栏目中，又再现了文化人扎根江夏，历尽坎坷的人生历程。在“群文史话”中，仿佛又听到了悠扬悦耳的歌声和人来人往扶老携幼的热闹情景。“难忘岁月”把人们的思想带到了非常年代，就象是昨天、前天发生的事情。还有“名人踪迹”、“史海钩沉”、“诗文选录”等。细品起来令人联想，触文生情，感

人之深，值得留念和回味。区政协副主席熊才胜同志说得好：“文化是沟通人类心灵的桥梁。文化是一个国度、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单位的根，是其赖以生存和壮大的灵魂。”遗憾的是这辑（文化史料选编）没有体现众笔之手，编辑人员没能广泛征集。作为流传后世的史料，应充分体现其广泛性、真实性和可读性的统一，必须以记事、存史、资政、育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文字力求平白、通顺、精练、生动，紧扣主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江夏来说，人们对生育养育自己的家乡都怀有一种深厚的感情。要把这种感情变为建设家乡的强大动力，这应是政协文史工作义不容辞的职责。

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旨在引起大家的关心和支持。了解江夏的昨天，宣传江夏的今天，建设更加美好江夏的明天。通过这种方式，达到我们目的是一种宽慰和希望。让我们朝着一个共同的目的，携起手来，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奔向小康，走向未来。

（作者系江夏区政协主席）

目 录

往事回眸

陈龙隐斗酒画百幅.....	1
陈士惠妙笔刻春秋	5
喂猪状元启思路.....	8
重新敲开文化门.....	14
古稀七十再上岗.....	18
历尽坎坷更风流.....	20

人物春秋

文化人的良师益友——曹荷光.....	24
鼓书艺人陈小奎.....	29
西出阳关有故人.....	34
当代农民画家——罗建国.....	38
一枝红杏出墙来.....	44
农业社的掌舵人.....	48
祁金刚：牵手古人.....	50
马拉松漫画情结.....	55

群文史话

石子岭社员俱乐部.....	61
《挑花篮》献楚天.....	66
安山“白毛女”——董光梅.....	70
欢歌笑语凤凰头.....	74
长山岭上唱新歌.....	77

果园新歌传万家.....	81
“百花”大赛春常在.....	84
勤奋耕耘护新芽.....	87
勇于求索出新招.....	92
群艺之花开不败.....	98

难忘岁月

第三次被点名.....	104
回顾修志工作.....	107
真情实话明心志.....	112

名人踪迹

毛泽东与许志行夜宿干鱼庙.....	142
张体学的故事.....	145

史海钩沉

探“宝”觅知音.....	151
《华夏新家谱》诞生始末.....	155
《杜罗克风波》创作前后.....	163
我热爱文史工作.....	166

诗文选录

艺海的思念.....	170
秋境.....	172
我常常享受一种孤独.....	173
吟得短景似画图.....	176

陈龙隐斗酒画百幅

“李白斗酒诗百篇”成为千古美谈。无独有偶，1952年我初到武昌县（现江夏区，下同）文化馆工作，便结识了一位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酒仙”，并与他共事整五年。此人姓陈，名龙隐，四十出头，豹骠人。称龙隐为“酒仙”并不过份，一次能饮两斤汾酒而面不改色。他平时并不酗酒，而是要用酒来燃烧自己的创作激情。乘酒兴挥笔与他人共同切磋人物肖像、招贴画、连环画、幻灯片等形象思维，从点烛照案画到东方发白。

1952年是全国土地改革结束后的第一年，纳入我眼帘的第一幕，便是那些当家作主人的翻身农民缴纳公粮的热烈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汉口的中山公园举办了“中南土地改革实物展览”，各种的实物栩栩如生。我还记得有一名广西的恶霸地主，将他家丫环活活蒸死的蒸笼，一位湖南贫苦农民的一床破似渔网盖了两百二十多年的被絮……贫苦农民被恶霸地主盘剥压迫的血泪史，使千百万观众震撼。在返回的途中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们县也可以举办土地改革实物展览。

我把这一想法向詹自镜（时任正馆长）作了汇报，他完全同意，并嘱我尽快写出方案，呈报县委宣传部。我同龙隐一同策划，没过几天方案就拿出来了，我亲自送给了宣传部长曹荷光。荷光同志看了十分高兴，还反复叮嘱：“一定要深入下去，紧密依靠群众，多找原始资料，一定要把展览办好。”

在荷光同志的支持和关怀下，我和龙隐及文化馆的通讯员周福生，满怀激情地投入了筹备工作。

当时文化馆建立才一年多，各种条件都很简陋，连一部照相机都没有。我们从河塆大咀直到保福，从土地堂杨桐到大屋陈，深入到每一个需要取材的角落。经过走访细查，收集了许多贫苦农民的卖田契、卖房契、卖儿契、讨饭碗、讨饭棍，盖了一百几十年的破棉絮，穿了三代人的破棉袄，百姓被恶霸打伤致残的血衣，官僚地主穿过的虎皮、豹皮、狐皮服装，用过的美人镜、美人杯、天然藤椅、檀香床、收租秤、斗等物品，以及苏区保福乡大革命时期农会张贴过的布告、通知，用过的刀矛、梭标、烈士的血衣等近千件实物。没有照相机拍照，龙隐就对一些实物的主人现场作画，画下了各种人物速写近百张。

在文化馆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由我写文字说明，由龙隐作艺术装璜的“武昌县土地改革实物展览”于1953年3月在古镇金口展出，金口镇党委书记王炳友主持开展。在展出的半个月中，观众络绎不绝，来自全县各地近5万名干部群众观看了展览。

这次展览取得圆满成功，同志们都十分高兴。通讯员（兼炊事员）小周炒了几个拿手好菜，如木新菜（金口江边沙滩上的一种野菜）、金口烧腊、红烧鲤鱼等以示庆贺。

好菜好酒，成功的喜悦使大家频频举杯。龙隐为自己在展览中付出的心血获得回报感到特别高兴，不知不觉两斤白酒下了肚，并兴高采烈地为大家表演节目助兴，博得了阵阵掌声。

1953年的春，我和龙隐深入龚家桥乡，住在荷光同志蹲点的林宣乡互助组的记工员江启华的家中，开始了文化宣传为大生产服务的新征程。武昌县农民自古以来便有互助的传统，栽秧割谷之时，一些邻居亲戚都来互助。土改后的龚家桥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投入春耕大生产的农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将传统的互助加以充实提高，建立起适应生产大发展的长年互助组。荷光同志一马当先，依靠来此种田的黄冈

籍中年农民林宝卿，在我县首次建立了比较科学并具有明确生产目标的
生产互助组。一石激起千层浪，“林宝卿互助组”在春耕大生产中的科学
安排，特别是推广水稻良种胜利籼的作法，在龚家桥乡如雨后春笋般
地推广开来，许多农民都步他的后尘纷纷成立了互助组，很快掀起了春
耕互助的热潮。

目睹林宝卿互助组的茁壮成长，我不禁产生了炽热的创作激情，便
熬了一通宵，林宝卿互助组的故事在笔下就绪。我给荷光同志过目，他
看了高兴地问我：“投稿《湖北日报》？”我向荷光同志汇报，文化馆
最近收到了一台崭新的幻灯机，这是我国著名女作家丁玲将她所著《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全部奖金买了幻灯机，分别
赠给全国各地文化馆使用。我打算与龙隐合作，将《林宝卿互助组的故
事》画成幻灯片，深入到纸坊的一些村庄巡回放映。

“太好了！”荷光同志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小张，愿你与龙隐马
到成功！”

我和龙隐高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我们同住一室日夜切磋，努力工
作，并经荷光同志指点，画成了四十张画面。幻灯片是在一小方玻璃上
画，工笔细致，来不得半点马虎，我买来两斤上好的谷酒，龙隐就着一
碗油炸花生米，乘着燃烧的艺术激情，在一盏煤油灯下，一丝不苟地工
笔于小块玻璃之上。待到金鸡报晓时，《林宝卿互助组的故事》的幻灯
片顺利完成。这部江夏第一部幻灯故事片，首映于林宝卿互助组。荷光
同志非常高兴，上了“土电影”的许多农民都喜得合不拢嘴。这部幻
灯片还巡回在黄自村、丁字村、熊家岭等村放映，使互助组这一新鲜事物
在纸坊区全面开花结果。深秋，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刘西尧的夫人来龚
家桥乡视察工作，当她知道我是文化馆工作人员时，高兴地说：“文化
馆为生产服务干得不错，你们对林宝卿的宣传很好！”

1954年春夏之交，长江发大水，全区上下都投入了防汛抗洪，文化馆也全力以赴，开展着形式多样的防汛抗洪宣传。面对滔滔的洪水我突然产生一闪念：你为抗洪干了些什么？我与龙隐切磋，画一幅较大的招贴画，画一位英勇的抗洪战士，展现你为抗洪干了些什么。

龙隐一边喝酒，一边画，整整熬了一个通宵。第二天的上午，我和小周将这幅用白官布画成的大画悬挂在金口镇的闹市。画中是一位目光炯炯的抗洪战士，在白浪滔天的洪水中，伸出铁的臂膀，用手指着看画的人们发问：你为抗洪干了些什么？对激起当时奋力抗洪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高松）

陈士惠妙笔刻春秋

1953年秋，我来武昌县后收到第一篇文艺稿，是纸坊官家畔乡小学老师汪启松创作的顺口溜《农民喜送爱国粮》。不久，我又收到纸坊普庵乡农民张育方创作的讴歌他们村里先进农妇的快板《高菊英一马当先》。与此同时，各乡镇文化站的同志，也陆续写来一些与火热的生活相呼应的短小精悍的文艺稿件。文化馆应责无旁贷地将这些来稿编辑印刷推向社会。我的这一设想马上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并决定由五里界文化站的陈士惠协助我创办油印小报，给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

陈士惠系湖南浏阳人，四十多岁，家大口阔，有四儿一女。老陈在抗日战争中参加国民党部队，曾在抗日烈士戴安澜将军主持的抗日远征军中服役，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戴安澜将军在缅甸领导的密支那反日战役。但老陈一直是随军的一名中尉司书，专门在钢板上刻写蜡纸，然后用油印机印成各种文件。长年的刻写生涯使陈士惠练就了一支刻写蜡纸的妙笔，他刻写的字迹工整，一丝不苟，所刻字迹与铅印的仿宋体小字如出一辙。他还练就了油印的硬功夫，一般人所刻的蜡纸印到几十张后便会漏墨，模糊不清，他刻写的蜡纸印到两百多张仍然字字清晰。有士惠这样的好搭档同办小报，真是得心应手。

1953年的秋冬之交，《武昌县文讯》在我和老陈的共同努力下出刊了。它经过各乡镇文化站，迅速传给许多读者。汪启松创作的《农民喜送爱国粮》和张育方创作的《高菊英一马当先》，还成了各乡镇业余剧团的演唱节目。

不久，《武昌县文讯》的来稿量大增，既有讴歌江夏新人新事新思想的顺口溜、快板、旧曲新填等，还有《干鱼庙》、《仙人山》等民间

故事及传说。为此《武昌县文讯》不得不扩大版面，由刻印一张蜡纸扩大到刻印两张蜡纸，成为一张对开的油印文化小报。

老陈除了刻字一丝不苟，还能在每篇作品的题头，刻出以图点题的各种形象画，使读者有一种图文并茂感。在十六开的白纸中对印两张蜡纸，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士惠总是站在油印机前，一手按着机框，一手滚动着印滚，不轻不重恰到好处地滚推，所刻之字便清清楚楚地印在纸上。印刷两百张《武昌县文讯》，老陈要站立三个小时以上。他的敬业精神，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让我刻骨铭心。《武昌县文讯》不断送到广大读者之手，许多作品都被一些乡镇业余剧团排练演唱，其中有些江夏群众活动的新闻，还经常被湖北省文化厅社文科编印的《群文通讯》转载。同年我参加湖北省文化干部培训班学习，我带去的《武昌县文讯》，几乎所有的同行都为老陈这支刻蜡纸的妙笔喝采。我还在培训班上作了创刊《武昌县文讯》的专题发言，受到同行们的充分肯定。主持培训班的陈国钊同志（后任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指出：“武昌县文化馆开了一个好头，希望所有的文化馆，都能办这样的小报，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为群众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

士惠的这支妙笔，不久便被中共武昌县委看中，将他调到区委办公室，专门刻写油印各种文件及《生产简讯》。

真难舍老陈离去，但县委需要这支妙笔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在为老陈离去饯行中，他喝了两杯酒後激情地对我说：“小张，我无非是多吃点苦，多熬几个夜，以后你编好《武昌县文讯》给我，我照样给你刻好印好。”

太好了！我为有老陈这样的好搭档而感到欣慰。他果然说到做到，经常一熬一通宵，在为区委刻写印刷《生产简报》及诸多文件的同时，总是按时将我给他的《武昌县文讯》刻好印好，使文化馆这条通向读者

的心灵之桥畅通无阻。

老陈为文化馆刻印的各种演唱材料也非常之多。1955年的秋天，宣传农业合作化，文化馆在纸坊举办全区十二个业余剧团大汇演，其中许多节目的本子都是由老陈刻印的。而刻印最大的一项，便是我创作的六场现代楚剧《同心记》：刻了整整十五张蜡纸。

1970年，我被流放到梁子湖畔的一座猪场，每天下湖绞湖草喂猪。有一天，突然碰见一位放鸭人，他亲切地喊我：“张叔叔。”

原来，这位放鸭人就是老陈的大儿子于安。他告诉我：父亲1957年因历史问题被开除回家，定居在纸坊姜家畈村。老陈在生产劳动之余仍然握住他那支奇妙之笔，县里乡里总有人找他刻写油印，也不知刻写油印了多少张。武昌县有口皆碑，都承认他是武昌县妙笔，也是当时孝感地区少有的一妙笔。文化大革命开始，老陈遗下亲人撒手西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春雨，使神州万物复苏而生机勃勃。陈士惠虽然去世，党的政策还是还了他只是在国民党部队干过刻字油印职业的清白之身。

时代进步了，社会发展了。五十年前，用蜡纸刻写油印的《武昌县文讯》早已成为用电脑输入激光照排的《江夏文艺》。从1953年起步，到今天已整整五十年了。为纪念《江夏文艺》出刊五十周年，决定发动全区文化名流撰稿，编印精美高档的专刊。我听罢欢欣雀跃，全身心彻夜撰稿、组稿，像回到了风华正茂时，热情地投入到我所热爱的事业中。

此刻，老陈那一丝不苟地刻印《武昌县文讯》的敬业形象，仍然活生生地在我的眼前闪现。

（高松）

喂猪“状元”启思路

1956年初冬，即将步入三十岁的我，怀着依依惜别之情，离开我倾注了五年心血的文化馆，到当时中共武昌县委创办不久的武昌报社任记者。

我视报道本地区的各种新闻为形象思维积累，马不停蹄地走村串户，撰写了许多人物特写及其它稿件。如豹澥乡全国劳模汤万桂主持的同力农业生产合作社《插秧第一天》的报道，在武昌报以整整一版刊出后，在农村引起强烈反响，当时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春耕生产。

年终，武昌县举行劳模表彰大会。纸坊区郑店乡青年小伙冯遂海在大会上生动的发言，不断引起听众的热烈掌声，我也被深深感动了。

冯遂海二十出头，郑店乡冯家村人，喜欢喂肥猪，他家中每年都要喂肥猪两头。遂海加入农业合作社后，凭自己的切身体会，为了增加社里收入，他“毛遂自荐”给社里喂猪。在农业社的支持下，他在鲁湖畔盖起了简陋的猪栏，买了近二十头猪崽，可是新婚的妻子不肯与丈夫同行，且年迈的母亲也坚决不同意。

他顶着妻子和母亲的压力，坚定不移地只身去鲁湖。春去冬来，他睡的被絮被猪啃烂了，甚至连煮饭的小锅、饭碗，都被猪掀翻，母亲来吵妻子来闹，也没有动摇他喂猪治贫的信念。历经多少磨难，猪喂得膘肥体壮。年终，社员们终于腌上了腊肉，卖肥猪的钱给社员增加收入。

我除了撰写《养猪状元冯遂海》外，遂海的感人事迹使我深受感动，开阔了我形象思维的思路：他无疑是新中国农村带头为集体致富的先进青年人。而这篇不足千字的《养猪状元冯遂海》仅仅是一条新闻，怎么可能深刻揭示这位农村新人的精神风貌呢？

当时，中国文化部向全国作家包括业余作者征求电影文学剧本，以推动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得知这条消息后我十分高兴，联想到养猪状元冯遂海活生生的事迹，既有活生生的人、生动的情，还有许多活生生的细节，完全具备了故事的完整性，而且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思考良久，我决定以冯遂海为基本素材，创作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应中国文化部的征稿。

我去鲁湖三访冯遂海，丰富的素材溶入我的脑海。一旦伏案劳作，许多问题便接踵而至：首先这部电影中的第一号人物，究竟是男性好还是女性好？能不能将素材中的男主角换为女主角？假若停留在妻子不同意母亲反对的原素材上，能否揭示出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冥思苦想中，我在纸坊熟悉的一些冲破封建桎梏投身家乡建设的农妇高菊英、马桂英、徐群娣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闪现。她们不仅有戏，而且有大戏！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从艺术切入显示社会意义就不能高于生活。构思下来，我决定写一位农妇冲破封建桎梏，历经种种曲折坎坷，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养猪场的故事。接下来的问题是电影文学剧本该如何写？

我去新华书店寻找有关读物，但找遍书架才找到两本：一本是夏衍根据鲁迅原著《祥林嫂》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祝福》；一本是苏联作家格布里罗维奇所著的电影文学剧本《玛申卡》。我反复通读精读，这两部作品成了我入门电影的导师。与此同时，当时武汉正在举办“南斯拉夫电影周”，我反复看了映出的各种影片，特别是其中的《旧仇新恨》与《当机立断》，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终于使我的第一次创作电影文学剧本从音像切入而顺利展开。

执教于中南民族学院的父亲，让我在他雅静的书房执笔。从除夕开始到正月初三，我昼夜伏案，在父母亲的支持下一气呵成了取材于武昌

县的电影文学剧本《山野风波》。初稿完成的喜悦，令人欢快不已。

报社的采写任务繁重，我得经常下乡采写，只能在工作之余修改完善剧本。至1957年3月，《山野风波》才终告成。不久，我便将《山野风波》寄往北京中国文化部电影文学剧本征集办公处。

4月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武昌报的同事吴孝先（后任江夏区广播电视局工会主席）、胡传利（后任鄂州市委副书记）来我家，交给我两封信，一封是上影的责任编辑王世镇写给我的，他在信中提到《山野风波》的题材新，人物有特色，故事较完整，具备拍摄基础。他已与电影老导演徐苏灵商议，徐导同意导演《山野风波》。并要我尽快赴沪，修改完善《山野风波》；另一封是给中共武昌县委及武昌报社的，大意是请中共武昌县委及武昌报社助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一臂之力，同意给我创作假，去上影修改完善《山野风波》，以便投入拍摄。

当我将上影寄给我的两封信交给报社负责人丁天柱过目时，得到的答复是：

“这事你要直接去找县委领导。”

县委梁书记很重视上影修改定稿《山野风波》一事，并提交县委开会研究，让我等候通知。

到了五月中旬，我第三次找梁书记，是在他的住房中。

梁书记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我去上海修改剧本可以。可以什么？可以请长假去。

我茫然不知所措，在万般无奈中只得向父亲诉苦。

父亲哈哈大笑地说道：“新中国需要新电影，全国人民都需要新电影！国湘，《山野风波》是新电影，讴歌农村妇女觉醒，冲破封建桎梏办猪场养肥猪，这是最新的电影！既然中央文化部都肯定了《山野风波》，我相信中共湖北省委，还有文化厅一定会支持的。”

父亲的一席话极大地鼓舞了我。我很快便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宣传部以及文化厅（局），向有关领导如实反映情况，并将上影责任编辑王世镇给我的来信给他们过目。

省文化厅厅长方西握住我的手说：“小张，希望你全心投入，尽一切努力改好本子，为湖北的文化艺术争取荣誉。”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的同志分外热情，为《山野风波》能被上海电影制片厂选中而高兴。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及时给中共武昌县委组织部打电话：让我去上海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时间不限，改好为准则。

不久，县委组织部长刘永泉便来找我，满面笑容地对我说：

“小张，你为武昌县办了一件大好事哇！听说《山野风波》你是根据劳模冯遂海写的？”

刘部长亲切地与我握手道：“小张，好好努力，一定要把《山野风波》改好！”

“感谢刘部长的关爱，我一定努力再努力！”

我满心欢喜地踏上大上海的土地，搭上去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有轨电车。

当我跨进上影，王世镇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他说将及时安排我与老导演徐苏灵见面，并派小轿车亲自送我到衡山路的上影招待所。

第二天我与导演徐苏灵、王世镇见面，让我把《山野风波》的故事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

徐导全神贯注地听，他高兴地说：“本子的基础好，故事也完整，就是凤英这个主角还单薄了点。她离开新婚不久的丈夫，去利用古老的祠堂作猪场，为社员养猪。凤英在婆母阻挠丈夫的反对下坚持到成功，剧本虽然写了那位复员军人的支持，但发掘不够。”总之，希望我在人物刻画上深下功夫。